



最早研究《天盛律令》的俄国西夏学家克恰诺夫，在翻译时多采取意译的方式，本段译作：

四种人〔牧人、农夫、商贩、车夫〕以及属主人所有之奴仆，若因已行犯罪被处苦役终身不得回自窝者，或因行窃被处有期苦役者，按律都应列为重役罪犯。因其他犯罪而被处有期苦役者，按律还应处以杖刑并施烙印。根据其所获苦役罪，可给其戴镣，并将其本人遣回其窝下主家或管家处。若这些人中前科服刑后又重犯罪，〔重〕获处苦役时未处杖刑者，则不论苦役期长短，都应处以杖刑，并施烙印，亦列为重役犯。若此类人一次次不断重行犯罪时，则每次都应按惯犯加重处罚。^①

克恰诺夫没有将“毖筭箐”翻译出来，检阅克氏汉译本，相关法律条文大都如是。史金波、聂鸿音、白滨等先生的《天盛律令》汉译本是在逐字对译的基础上译出的，对此段翻译如下：

牧、农、舟、车主等四类人及诸人所属使军、奴仆等犯种种罪时，长期徒刑，及因盗而服劳役，依边等法当派做苦役者以外，其他犯种种杂罪，获短期劳役者，当依法受黥杖。因劳役当戴铁枷，按属者及内中等何处所属管事当付嘱。其已判断，以后重犯罪，则杖罪以外，得劳役者无论大小，当依应得黥杖增加，应派做苦役。如此重犯不止时，罪当总计增加，按边等法判断。^②

据此可知，在《天盛律令》汉译本中，史金波先生等将大部分“毖筭箐”译作“边等法”，究其缘由，“毖”意为“边、近、岸、侧”，“筭”意思是“平、等、齐”，“箐”解释为“礼、闇、法、仪、式、制”^③，将每一个单词词义叠加起来就成了“边等法”，这显然属于直译法。另外，汉译本也将其译作“平级法”，如卷十《司序行文门》第20条“案头派法”：

“中书、枢密诸司等应遣案头者，属司司吏中旧任职、晓文字、堪使人、晓事业、人有名者，依平级法量其业，奏报而遣为案头。”^④

①〔俄〕克恰诺夫俄译，李仲三汉译，罗矛昆校订：《西夏法典——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8页。

②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

③李范文编著：《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7，289，317页。

④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77页。



也属于主谓式，其词义等同于构词语素“筭”的语素义，进而可知“𢵿筭”大意为“等、同等、相等、相同”，“𢵿筭𢵿”可译为“同等法、相等法”。所论证的词义是否准确还要将之置于法律条文中加以验证。

将“同等、相等”义代入前引《贪罪状法门》的“枉法贪举赏”条，改译为“因枉法贪赃，物主人自告，则当还属者，他人举告，则按杂罪之告赏同等给法，其数多少，当于交还贪物中出给。此外，超额及以问解明等，一律皆当交公。”新译文将“按边等杂罪之告赏给法”改为“按杂罪之告赏同等给法”。前半条律文的意思是，官吏枉法贪赃，被物主人告发，当将所贪之物归还物主人，如果是别人举告的，就按照举告杂罪给赏的同等标准给予奖赏，所得奖赏多少，从举告而缴获的贪物中拨给。此条提及的“杂罪告赏”赏赐是多少呢？遍检《天盛律令》，卷十三《举虚实门》记载：“诸人举他人，予举赏法——分明以外，犯余种种杂罪时，获死罪赏五十缗，三种长期、无期等赏四十缗，自徒四年至徒六年赏三十缗，自徒一年至徒三年赏二十缗，月劳役十缗，杖罪五缗，当由犯罪者予之举赏。”^①又如卷十七《库局分转派门》之“库遣磨勘行用等法”中的一款新译：“前述不派库局分而逾期时，京师所辖司人当告于中书、枢密所管事处，当行经略使处，应伏罪则令伏罪，应判断则判断。经略使人应派不派，及本人所辖库局分应转不转，应派不派等，一律依边中诸司库局分应转不转、应派不派同等之罪情法判断。”最后一句也作如上改动，文意显然更为明晰了，即是经略使应派遣库局分却没有派遣，本人所管辖的库局分任职已经到期，应当迁转而不予迁转的、应当派出而没有派出的，要按照边中地区“诸司库局分应转不转、应派不派”的判罚标准进行处罚。而后者的判罚标准在本款之前已有明确交代：

若边中诸司人库局分应转不转，应派不派，应起行而不起行等时，依地程远近之去留磨勘法当分别明之。彼期限内延误，则局分大小之罪依延误罪法。及彼逾期，则一律自一局分至三局分徒一年，自四局分至六局分徒二年，自七局分至九局分徒三年，自十局分至十二局分徒四年，自十三局分至十六局分徒五年，自十七局分至二十局分徒六年，自二十一局分以上一律获徒八年长期。若库局分人半有半无，或派人而不行文，或行文而不派人等时，比前述库局分一等等全不派之各种罪状当依次减一等。^②

有关“同等法”的条文也是如此，“同等法”指的是相同的法律规定。如前文所引用的《戴铁枷门》“重犯罪遣”条可以稍做调整：

①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50页。

②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26页。

牧、农、舟、车主等四类人及诸人所属使军、奴仆等犯种种罪时，长期徒刑，及因盗而服劳役，依同等法当派做苦役以外，其他犯种种杂罪，获短期劳役者，当依法受黥杖。因劳役当戴铁枷，按属者及内中等何处所属管事当付嘱。其已判断，以后重犯罪，则杖罪以外，得劳役者无论大小，当依应得黥杖增加，应派做苦役。如此重犯不止时，罪当总计增加，按同等法判断。

该条第一句的意思是说牧、农、舟、车主等四类人及其所属使军、奴仆等犯诸种罪状时，判长期徒刑，或者因盗窃而服劳役，要按照同等法做苦役，犯各种杂罪，判短期劳役的人，还要受黥刑和杖刑。其中，“同等法”为何？我们查阅《天盛律令》，可知其指的是上一条内容“诸人因犯罪，判断时获服劳役，应戴铁枷时，短期徒刑当戴三斤，长期徒刑当戴五斤”^①，也就是说这四种人和他们的奴仆等因犯罪而判处长期徒刑、因盗窃而服劳役之时，也要按照一般人犯罪服劳役的规定前往指定地区服劳役，其具体规定是：“劳役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其上以一等论，短期所至为六年。自此以上，始于八年，取名长期。八年、十年及十二年三种长期者，期满依旧可回院中。此外其上无期者为十三年劳役，则苦役期满亦当住无期处。”^②本条末之“同等法”亦复如是。再者，《律令》卷二十《罪则不同门》之“告状私人田地房舍求凭据”条，改动之后为“诸人告状，索私人田地、房舍凭据者，当问其本人及田地、房舍接边者。当遣人视之，明其界限，置土堆，无参差，非军典争逃人，则当予之凭据。若有官方所予论文，旧有凭据而失之等，亦依同等法，官家当再予凭据、论文”。此条“同等法”指的是本条前两句内容，意即如果有人将官府所颁田地和房屋的论文、凭据弄丢了，可以上告官府，请求重新颁发，官府应当询问本人及邻近其田地、房屋的家主，明确界限，而且没有其他争议，就可以颁给其新的田地和房屋凭证。改动之后，律条简明、清晰。

将“𦵑𦵑”“𦵑𦵑𦵑”两词的新译运用于其他法律文献中也是成立的。如《法则》卷三《发兵集校门》第一条：“融揉鉢科緱施裘綈跨𦵑練舉舅癢戊舅稱弛維壳𦵑駁您𦵑積丑吞𦵑紛練豺飼前籃吞𦵑設息槽𦵑𦵑紛練汕息庵癢豺飼前𦵑灯稱母𦵑舅𦵑臨嘻綈𦵑𦵑屬𦵑駁誦誦入臀狐𦵑艷(?)瑪𦵑宦鳴丑”^③，可以译为：京师府中，家主中杂职诸人，有两百到三百缗钱的，不需纳驮马，与番人不堪往敌界中一律相等。番人一番往敌界，则摊派十缗中当减七百钱。钱数敛集，仓库何时满(?)时，当使纳(买)马。在本句中，“𦵑𦵑”作动词，表示“同等、相等”，意思是京师地区

①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

②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605页。

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财产只有两、三百缗的家主，在发兵集校时，不需要上交驮马，与番人（党项人）不堪出征敌界而不予纳马是一样的。若是换作“边等”，则文意含糊不清，不明所以。再如《亥年新法》卷二有“毖筭箕”之用例，学者所拟译文：“长期十二年愿服劳役，依黥法当刺；无期十三年及长期十二年、十年、八年一律赎六年；短期六年愿服劳役，六年以下一年半□减应赎，所犯黥刑短期上不刺字，可以全赎；刺字则劳役年数减半，依黥字等边法当赎，不愿赎则依所犯之罪依法当黥。”^①或许觉得学界一贯译传的“边等法”难以理解，研究者将其改成了“等边法”，但“等边法”对于辨析文意同样没有帮助。如果将“同等法”代入本条，则疑窦顿时消弭于无形，“依黥字等边法当赎”即是“依黥字同等法当赎”，所谓“黥字同等法”主要指的是《天盛律令》卷二《黥法门》的相关规定，如此则字顺文从。

从以上疏解可以看出，将“毖筭”“毖筭箕”译为“同等”和“同等法”是较为准确的，文意顺畅，不像“边等”“边等法”那般突兀和费解。简言之，“毖筭箕”并不是以往认为的单行法律，而是与“毖筭”一样，都是指代，乃是省文的表现形式。通过这样指代的方式，律令的各种规定得以完整表达出来，还节省了法典的篇幅，颇有“文省事增”之效。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同等”和“同等法”视为比附的一种，正如僧道未在官府注册，“举赏依举杂罪赏法当得”^②；破坏河渠及相关设施，举告赏依从举报偷盗赏^③，等等。

四

将已经消亡的西夏文写就的法典《天盛律令》准确翻译成汉文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克恰诺夫教授尝言：“这类典籍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一译而就。需要一代、两代、三代学者，对它二次、三次甚至十次翻译，每次都要仔细推敲原文，才能使译文臻于完善。”^④当前，学界对西夏文《天盛律令》的研究已经进入深耕细作的时代。如何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将《律令》中的疑难词语考释出来，可能需要汇聚多学科知识。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西夏语言学知识都将是头等重要的，其中从词汇学的角度进行切入，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取得一些突破，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翻译《天盛律令》之类的法典文献，也能够助益于释读佛教文献，值得我们多做尝试。

（责任编辑：王培培）

①梁松涛：《〈亥年新法〉整理与研究（卷一至卷四）》，宁夏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5年，第107页。

②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09页。

③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06页。

④[俄]克恰诺夫俄译，李仲三汉译，罗矛昆校订：《西夏法典——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页。